

# 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

An Outlook on Asia-Pacific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2 年度报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际形势做出重要判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同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形势在亚太地区反映得更加鲜明。中国作为亚太大国，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自身外部安全和发展环境发生地变化，也更加直接地承受着变化的冲击。

2022 年最值得关注的国际大事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升级和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化、延展。这两件事深刻影响了国际关系、地缘安全和全球经济，牵动亚太局势的演变。

党的二十大重申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战略目标，亚太及中国周边地区以其重要性，自然而然成为中国推动实现有关理念的努力方向和实践场。

2022 年，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将形势研究和对外交流的重点放在了亚太方向，在吸收学界多方观点和意见的基础上，撰写了以“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和中国的战略选择”为主题的年度报告。全文共分四个部分：（一）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二）东盟“中心地位”锚定亚太多边主义；（三）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之间；（四）中国的战略选择和亚太愿景。

## 第一部分 处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地区

亚太地区在冷战时期并非美苏对抗的中心地带，但是也曾长期陷入阵营对立，相继爆发了朝鲜、越南、阿富汗战争，美苏在这里还挑起过多次政局动荡和小型冲突，东盟也是从支持美国的冷战政治集团为前身发展起来的。1970年代初，随着越战结束、美国收缩，亚太国家开始调整战略，东盟试图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建立共同市场提升安全和发展系数，日本在自主发展和倚美靠美之间摇摆。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美苏关系缓和、越南自柬埔寨撤军，中南半岛局势趋稳，谋和平促发展成为地区国家政策取向的主流，各国纷纷受到亚太次区域、区域合作的吸引，建立起多重对话与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冷战中期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亚供应链不断扩大，以日本为先导的“雁阵模式”逐步成形，奠定了新的繁荣基础，亚太内部开始形成梯级经济发展结构。

中国在自身开启改革开放的同时，主动融入亚太地区构建多边合作的进程。从1970年代末至整个1980年代，中国领导层对时代主题的判断调整为“和平与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自身的需要，也准确体现了亚太各国在同一历史阶段对地区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的追求。中国修好与东盟、日本等亚太国家的关系，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重塑中南半岛和平和参加斡旋柬埔寨问题的国际谈判，在亚太地区推动和平合作的姿态得到广泛认可和欢迎。1990年代起，中国深度融入和积极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同时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全面参与地区乃至全球产业链，并在柬埔寨维和、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等重大事件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成为亚洲和平与发展议程的维护者、贡献者和塑造者。

冷战结束后的30年间，亚洲维持了总体和平，实现了快速发展，与其他地区的动荡不安、战乱起伏形成鲜明对比，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

亚太和平与发展局面是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所有地区国家联手塑造的。搁置主权争端、淡化安全矛盾、聚焦经济发展，是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做出的选择。即便是美国，在将全球战略重心置于中东、欧洲一线的同时，也没有放弃经营亚太，加入和参与倡议了包括“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亚太区域对话和合作机制。

也是在这30年间，中国后来居上，成长为亚太和平与发展的主导性方之一，并且通过亚太走向世界。中国与亚洲各国建立起伙伴关系，不仅在贸易、投资、基建、财金、人文等领域强化合作，更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ARF）、东亚10+3和中国倡议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等渠道开辟和深化制度性联系，中方提出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地区发展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被广为接受。这一时期，亚洲经济的全球占比从1992年的28.7%提升至2021年的39%（按购买力平价计为47.5%），2021年亚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3.8%；中国经济的亚洲占比从1992年的6.5%提升至2021年的46.3%，GDP规模比日本、印度、韩国、东盟的总和还要多，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021年分别高达50%和25%。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亚太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倚重和疑虑同步增长，这种“与强为邻”的矛盾心态在国际政治中并不鲜见。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和中国崛起促使美国关注亚太。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洲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十年”的演变：第一个十年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原苏联空间”的解构和拉拢上，不惜在前南动武。第二个十年聚焦反恐，并以此名义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推进大中东民主改造。目前仍在演进的第三个十年将战略目标锁定中国，并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注意力向亚太地区聚拢。奥巴马后期，美国宣示“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意欲“转身亚洲”牵制中国影响力的快速增长。但当时美国

仍在“两面下注”，试图遏制中国和从对华接触合作中获利“两不耽误”。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走向“战略清晰”，把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推出“印太战略”，对华进行全政府、全方位、全领域的打压，甚至以歇斯底里的方式制造意识形态对立。拜登上台后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基调，进一步强化布局，调整了前任“打乱仗”的激进模式，“稳、准、狠”地推进脱钩，试图将中国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剥离出去。一是将竞争重点集中到科技领域，对中国能力的增长采取更严格的限制、隔离措施，制定非自由经济的产业政策，出台《芯片与科学法案》和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新规。组织盟友伙伴重组供应链，从“离岸外包”转向“近岸外包”“友岸外包”，试图摆脱关键产品对华依赖。这一系列做法导致美国曾经大力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被不断削弱。二是安全上采取“小动作”。以“切香肠”方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激活“以台制华”，包括继续售台武器、国会议员团常态化访台、助台拓展国际空间等，试探、踩踏中方红线。三是升级“印太战略”，在中国周边组建基于不同任务组合与协作模式的圈层，叠床架屋地编织“网格化”布局。推出包括加强数字贸易经济、提升供应链韧性、应对气候变化、加强税收和反腐败合作等内容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

经过连续三届政府历时十几年的持续调整，美国在亚太的强势“回归”呈现系统性的特点。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和“印太战略”高度聚焦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强调“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shape the strategic environment around Beijing），实则是与中国抢资源、争朋友，对冲“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导的地区合作项目，把诱拉亚太各国和分化中国的周邻伙伴关系网络上升到全球战略高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试图把战略竞争的主题强加给亚洲，使得这种“竞争”成为不仅是中美之间的、也是所谓“自由民主世界”与“威权专制世界”之间的矛盾，从而以此框定地区议程，拖拽着亚洲走向体系对立

的深渊。其根本目的是塑造美国对亚太的主导地位，从而切实保住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如果按照美国的路径走下去，亚太难免会形成“一个地区，两个体系”的局面，整个世界也将因此而走向分裂。

就在中美战略博弈作为一条矛盾主线日益左右亚太形势发展变化的同时，亚洲内部固有的问题也在发展，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是，众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悬而未决，这些问题多是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在域外力量卷入的冲击下愈发复杂难解。南海局势在 2022 年虽然总体平稳，“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取得新进展，但是一些国家非法扩建所占中国岛礁、勘采油气资源并联合域外国家加强针对中国军事制衡的行为仍未休止。二是，国家分裂主义、地方分离运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由于在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拒不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与一些外部势力沆瀣一气大搞“台独”分裂活动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海局势持续紧张。2022 年美国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严重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亚太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越南、菲律宾、缅甸等国家的政治稳定 and 经济发展持续受到国家分裂主义、地方分离运动影响。三是，一些国家发展道路仍未定型，政局不时出现动荡，给外部势力介入提供机会。缅甸政局变动后的紧张局势未有缓解，来自东盟的调解不得其门而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自我改革，“原苏联空间”仍在艰难消化苏联解体的后果。四是，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严重失衡、财政安全漏洞百出，在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双重作用下爆发债务危机并且外溢。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在 2022 年的经济困难和政局波动即是这方面典型。五是，局部意义上的民族宗教矛盾尖锐，在西亚、南亚和中亚仍然存在暴恐和动荡土壤。阿富汗问题是亚洲长期疮疤，美国自阿富汗仓惶撤军后，未能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后续人道、粮食危机和在美被冻结资产问题，使阿问题重新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六是，在大国战略博弈和军事联盟协从效应的刺

激下，不同历史阶段热战、冷战的遗留问题，比如朝鲜半岛的南北对立和核紧张在 2022 年下半年持续升温，有重新激化甚至爆发冲突的危险，亚太新一轮常规军备竞赛乃至战略军备竞赛也初露端倪。这些历史和内生性矛盾同大国竞争、外部冲突效应相叠加，存在被激化和放大的风险。

亚洲在冷战后的主要成功经验在于，地区内国家坚决锁定经济发展的优先议程，选择和平合作、利益交融的路径，不断增进互信，实现梯次繁荣和安全与共。在成长为世界经济增长高地的过程中，亚洲国家的安全自主性要求显著增长，建立起缜密交错的战略对话机制和功能合作网络，中小国家成功调动域内外大国为亚太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保障和公共产品，一个以合作为主轴的协调可期的中美关系便是其中重要内容。然而现在，面对复杂激荡的世界变局和不断加剧的大国竞争，亚洲的和平与合作共识遭遇挑战，多国内部矛盾暗流涌动，彼此分歧再度突出，维系区域合作的要件开始松动。亚洲步入一个冷战后不曾有过的彷徨阶段，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面临的选择是继续遵循基于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经济发展优先的地区合作模式；还是突出安全关切，按照不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大国亲疏和供应链角色划线，选边站队、走向分裂？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地区国家并未选择盲从。众多亚洲国家对美国有着安全上的需求和购买力市场、数字技术等方面的期待，心中不乏对美国更加关注和更多投入的期待。同时，面对壮大起来的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也希望采取包容性的“亚洲方式”而非排他性的“美制架构”平衡中国。亚洲国家普遍对地区合作议程有自己的坚守，对安全议题泛化的趋势保持警觉，希望继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国家和区域治理的现代化。各国支持以对话合作方式解决安全关切，不认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供应链的综合安全问题仅凭一个地区联盟就可以得到解决。韩国总统尹锡悦 6 月出席北约峰会发表演讲时就明确表达了这个意见。亚洲国家看重中国的发展能力和提供区域公共

产品的潜力，普遍不赞成在完善地区框架时排斥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得到美高度重视的印度，在参与美日印澳四国合作（QUAD）时也抵制了美将该机制军事同盟化的企图。不少亚洲国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和独立自主意识，反感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行为方式，不接受“自由民主对威权专制之争”的叙事，美国的价值攻势不仅缺乏吸引力，反而引发它们对自身政治安全的担忧。

上述复杂的顾盼心态在亚洲国家当中有较大共性，这决定了它们面对变局，更大的可能性是根据时之所向、势之所倚、利之所至，做出自己的“不选之选”。面对因大国竞争、发展失衡、内生问题持续等而不断扩大的“地区鸿沟”，外交务实主义在亚洲相当普遍，多数国家会在中美两国分别提供的利好面前“按图索骥”，各取所需。固然，也有少数国家存在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想法，欢迎美国“重返”，主动加入或者配合拜登政府做出相应的战略安排；还有一些国家存在较大摇摆性，试图左右逢源，甚至想从中美争斗中渔利，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国家拒绝选边站队，不愿成为大国竞争的场域或工具，将竭力发挥牵引和协调作用，确保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维护。

## 第二部分 东盟“中心地位”锚定亚太多边主义

东盟（东南亚）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居，是中国战略环境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也是中国合作伙伴最扎实和密集的方向。东南亚通连陆海、衔接两洋，堪称亚太地区“战略十字路口”，对中国构建“一带一路”、实现军事力量走向世界，以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都至关重要。东南亚也是中国经济内外两个大循环的结合部，是在市场规律推动下承接国内产业向外转移的首要方向，最有基础和条件率先与中国实现“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安排。在完善国际秩序的进程中，东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要实践场，能否



成功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海洋共同体”，将具有全局性示范意义。

冷战以后，东盟成长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的活跃力量。东盟对内依托基于“5C”（协商，Consultation；一致，Consensus；关爱，Caring；坚定，Cornerstone；团结，Consolidation）的“东盟精神”和“东盟方式”，加强自身凝聚力，推动共同体建设；对外借助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网络，推动区域、次区域合作，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其经济和外交实力的加强，东盟在亚太地区事务中不断强化其平衡大国、协调各方的“中心作用”。

过去 40 年来，中国以东南亚为周边合作的重要方向，在对外开放和融通世界的过程中，积极拓展与东南亚各国和东盟组织的关系。双方通过建立和提升对话伙伴关系、商谈和升级自贸区建设、签署和践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等，实现了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的紧密合作，携手创造了亚太经济发展的新奇迹，构筑起稳定的多边和多重网络化地区合作框架。

冷战结束时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以日本、美国或者韩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现在，中国成为东盟国家最大贸易伙伴，在各国占比达 25% 至 40% 不等，东盟对外货物贸易约 1/5 是与中国进行的。双方在地方层面也形成深度的经贸交融，两大市场之间“毛细血管”交织的密切程度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2022 年初“泛亚铁路”中国—老挝段的开通，使得相互联通更加便捷。越南近年在全球供应链中位置上升，有条件大量承接中企产能转移，与中国的产业合作紧密度持续增强。新加坡承接中国大量的转口贸易和约 70%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融资的流转。自 2013 年起，中国连续 9 年保持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2021 年，中方从新加坡进口额为 38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7%。2022 年第一季度，中方从新加坡进口额为 9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新加坡连续 9 年来也是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2021 年新加坡对华实际投资

103.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5%。截至 2022 年 3 月，新加坡累计在华实际投资 1240 亿美元。

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大国战略博弈的叠加效应置东盟于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困境。边境关闭、社会停摆、疫情反复暴发，对东盟供应链韧性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冲击，美国加息、全球通胀、能源和粮食价格波动等更是雪上加霜。缅甸政局激变、内乱不息影响到东盟团结合作的稳定性，冲击内部危机协调力，中美关系恶化、俄美关系崩溃、应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差异以及众多国际地区论坛暂停或转至线上，都影响到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中心作用”、施展协调能力的空间和效果。

东盟在 2022 年充分显示出身段灵活、善于应变的特质，抓住大流疫变化的时机积极行动起来。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分别利用承办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契机，提出着眼于重振一体化活力的口号，凝聚促合作促发展的积极性，再度巩固了东盟的“中心地位”，并展现出相当强的战略自主性。5 月，印尼、越南、泰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示将与所有伙伴和利益攸关国共同努力提振合作精神，强化东盟“中心地位”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信誉与作用。11 月，东盟籍三大峰会的成功举办，突出“开放、连接、平衡”的“亚太主题”，呼吁各方聚力应对粮食、能源、公共卫生等具现实紧迫性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有力牵制了大国战略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主导地区议程的态势。东盟峰会提出要加强互联互通，力争在 2025 年后实现可持续、全面和有弹性的东盟共同体愿景，并为此加快适应气变、智慧城市、能源转型、绿色增长、中小微企业等方面的改革。同时，东盟加快对多组双边关系进行提质升级，继 2021 年底与中国达成共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共识之后，2022 年底又与印度、美国建立了平行的对话关系，强调将与各主要力量加强海上安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多领域合作。这一系列

举措的目的是确保东盟继续成为多种地区方案的“汇合点”和国际投资“热点”。

美国拜登政府为推进其“印太战略”和对华战略竞争，面对东盟的自主姿态，刻意放低身段，加强争取工作，将美国在东南亚的布局重点放在争取第三方的支持上，力图使东南亚成为“形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前沿。

一是提升政治关系，扩大战略互通性。东盟在特朗普时期对美方提出的“印太”概念便采取了拿过来为其所用的作法，通过制定《东盟印太展望》建立对接窗口。白宫 2022 年 2 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文件把“向东盟赋能和促进东盟团结统一”列入行动计划。5 月的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和年底的美国—东盟峰会把双方关系升格至“全面战略伙伴”，提出的合作议程相当丰富，包容了新冠疫情、“经济连通性”、海上安全、人文交流、次区域发展、技术创新、气候变化、维护和平和建立信任等广泛内容，并与美国“印太战略”实施重点高度重合。

二是利用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恐惧心理，提出“集合威慑”（Integrated deterrence）的概念，强化对华军事遏制。此概念强调的是海空陆等常规力量与网天情等非常规手段并用的集合效应，调动盟友伙伴力量，构建军事意义上的综合威慑体系。美国恢复和扩大了与菲在南海的联合演训，并正就美军在菲获得更多基地准入进行协商。美国与越军事安全合作和能力建设从情报共享升级至联合作战。美国并继续以南海争议为抓手，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包括干扰“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推动“南海仲裁”结果在一些东盟国家实现国内司法化，帮助东盟国家发展海警力量。美国还时不时直接对中国岛礁进行近岸滋扰，协调日本、法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域外盟友介入南海局势。俄乌冲突爆发后，美日等国炒作“乌克兰的今天就是东亚的明天”论调，刺激地区中小国家对华焦虑感和不信任情绪，推动北约功能性合作的触角伸向日韩，与此前已搭建起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合作（QUAD）和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AUKUS）等小多边机制相结合，“化整为零”

的“印太版北约”若隐若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两洋(印度洋、太平洋)相衔”、“三海(东海、台海、南海)联动”，以综合性“离岸制衡”全面覆盖对华警戒，并尽可能多地消耗中国战略资源。

三是弥补经贸“短板”，开辟“平行赛道”，与中国竞争地区经济影响力。拜登政府深知美国在向东盟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零关税等方面缺乏与中国竞争的条件，遂采取了另辟蹊径的做法，提出“印太经济框架”(IPEF)，获得多数东盟国家支持。IPEF 本质上是行政化操作，不含关税准入条件，无需立法机构批准，只要参与局部合作便可认为是加入，重在重构规则标准，不能排除后续逐领域推出排他性、限制性细则。美方重点是发挥私人投资的优势，推动重塑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和贸易投资环境，并且注意发挥东南亚重点对象国的专长。比如马来西亚有芯片封装能力，英特尔宣布将投入 71 亿美元建厂；印尼的独角兽企业自 2020 年以来迎来硅谷的大举投资；英特尔、苹果、谷歌等美企已在着手扩大在越南的供应链。

拜登政府推动的对华战略竞争是一种“系统性竞争”。美以优厚的条件让东盟国家“全方位参与”其对地区合作议程的重置、供应链条的重组，乃至对区域框架的重构、地区规则的重订，有较大概率给东南亚区域合作带来丰厚成果。与此同时，不能排除会对中国影响力产生稀释和架空的作用。仅以供应链重组为例，如 IPEF 合作模式在东南亚扎根，不仅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落实、升级和延伸将受影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作出的便利安排也可能被分割。

美国在东南亚方向挑起的对华多维度竞争首先是一场“人心之争”，其特点是积极争取伙伴、树立合作“支点”。争的结果最终要看谁能真正做到尊重、照顾中小国家的利益和关切，提供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公共产品，谁能赢得东盟大部分国家发自内心的支持。这也是一场“议程之争”，美国竭力渲

染紧张气氛,想把地区和平合作的议程扭上军事安全轨道,为其战略部署提供“合法性”。中国则实施“富邻”政策,积极推进市场融合和基建联通,以促进共同繁荣。长远看,谁的倡议和行为最能反映地区潮流、引领区域合作,谁就能掌握更多话语权。这还是一场“规则之争”,中美将通过与东盟的具体合作和制度安排塑造地区的行为范式,比如,“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与“南海仲裁案”针锋相对,影响着海洋规则的演变;RCEP和IPEF各行其道,催生不同的经贸标准。长远看谁主导的范式能成为主流,就将在相关领域提供未来地区规则的基础。这同时是一场“地区安全框架之争”,东南亚为中美提供了地区安全观念的实践场,美国固守零和思维,坚持搭建基于“集体安全”理念的排他性机制,以“包容性”之名行“小圈子”之实,试图逐渐掏空东盟地区论坛(ARF)、10+8防长会等中方支持、长期运转、反映“东盟中心”作用和“协商一致”精神的地区安全机制的存在意义,与中国主张的基于“合作安全”理念的安全安排形成对立。

东盟组织和多数东盟国家从历史沿革的角度,一向对美国力量在本地区的存在持欢迎态度。但他们也一直对大国争斗持警惕和反对的立场。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成型,东盟意识到自己身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衔接地带,地缘战略价值上升,希望借势增强在区域的“中心”地位和大国关系中的“桥梁”作用。而东盟作为中小国家集团,其宣扬的“中心性”是以“开放性”为前提,也即,在东南亚地区引入不同大国势力,确保它们相互制衡,东盟才会更有安全感,一些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或对中国崛起后将发挥的地区作用缺乏信任的国家甚至主动邀请或者迎合美军事上的“重返”。但是,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恶化导致东盟国家内心不安全感增强,它们担心地区议程偏离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优先的轨道,对美国递来的脚本更多是“看单点菜”而非“照方抓药”。

东盟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除了利用大国相互制衡,更重要是主动

协调大国政策以谋取安全和发展利益。东盟深知均衡发展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才能更多发挥自身作用，因而拒绝选边站队，拒绝为了迎合美国而削弱同中国的合作议程，这是其行为底线。在此过程中，印尼、新加坡等国试图发挥思考者和协调者的作用，施展娴熟的外交技巧，呼吁中美保持战略克制，拒绝充当大国“代理人”，提出“新不结盟运动”的倡议，尝试在科技、供应链等领域建构更加开放、包容的多边网络。

### 第三部分 中美能否在亚太和平共处之间

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复杂、最具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双边关系。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在美国挑起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螺旋下滑，发生了从合作到竞争的质变。究其根源，在于美国对中国的判断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综合国力全面跃升，美国意识到面临被中国赶超的现实可能性，认为中国崛起构成对其世界霸权主导地位的挑战和威胁，遂大幅度调整对华战略，抛弃了奉行多年的以接触、容纳、合作为主轴同时保持限制措施的政策路线，转而对中国实施以压制、限制、排斥为主的战略。

2022 年 10 月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 60 多次提到中国，把中国定性为“国际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21 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以及“将威权治理与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相结合的大国”。报告确立了“竞赢”（out-compete）、“智胜”（out-maneuver）中国的目标，并且宣称，未来 10 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 10 年”。后续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核态势评估》、《导弹防御评估》等报告相继落实各项布局，规划对华“一体化军事威慑”、“海陆空三位一体核威慑”。以这一系列报告为标志，美国以应对“中

国竞争”、“中国挑战”、“中国威胁”为底色的全球战略定盘，亚太成为美国实施对华新战略的主要方向。

不过，美国自身也面临复杂深刻的内部矛盾和挑战，对华竞争中有强烈的服务其自身调整和增强实力的意图。同时，美意识到中国与冷战中的对手苏联截然不同，无论在实力体量还是成长潜力上都远超苏联，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与世界经济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没有做好与中国全面对抗的准备。现阶段美国希望能控制住竞争的烈度和范围，并在自己有需要的领域同中国保持接触和适度合作。因而，美国虽然在中国周围动作很多，但是在直接面对中国的竞争中，一直试图把不同议题做区隔化处理，反复强调要为两国关系设立“护栏”，“不打新冷战”，“防止冲突、免生灾难”。由此可见，美国的对华战略和竞争一直在“接触合作”和“竞争对抗”之间摇摆和试图取中，可称之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和平竞争战略”。

面对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与威胁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挑衅和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同时，尽最大努力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方对美方及其盟伴借台湾、南海、新疆、香港、人权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方底线行为毫不妥协，不断挫败他们试图打乱中国步伐、污名化中国形象的企图。中方鲜明反对美方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和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对话”，不允许其给中美关系带风向。中美固然在一些领域有竞争，但是，竞争绝非新时期中美关系唯一属性，美方大搞“战略竞争”话术，名为避免对抗，实则制造对抗，如果不加辨识地接受，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会被裹挟着滑入新冷战，甚至存在因具体问题上的对抗失控而走向热战的风险。

在坚决斗争的同时，中方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争取共同寻找正确相处之道。这期间，元首外交发挥着坚定的引领作用。在 2022 年 11 月中美元首印尼巴厘

岛面对面会晤以及拜登就职以来的数次元首通话和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始终推动美方与中方一道，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彼此关系，“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拜登同意确立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作出“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对抗，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的承诺。这次会晤的积极成果为双方探寻稳定彼此关系的路径提供了“机会窗口”。

受佩洛西窜访台湾等事件以及新冠疫情，中美在一些领域的高级别对话磋商机制的频率和活性下降，部分项目被暂停，人文交往也几近停滞。此次元首外交有力牵动两国关系回到理性对话的轨道，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对两国功能性合作的恢复和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在柬埔寨第9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举行会晤；两国财经、经贸团队在巴厘岛二十国集团峰会和曼谷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举行磋商；两国气候问题特使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期间正式磋商，所达成共识为大会取得成功奠定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二轨和民间沟通渠道和留学人员往来得到保存，中方各行各业支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人们仍在与美国战略界理性人士、友华人士和地方州、商界、基层民众积极对话，最大限度地争取到理解，也牵制了美国右翼反华势力影响力的滋长。

中方妥善应对美方在科技、经贸和资本市场等领域的封堵和脱钩断链压力。遵循科技和人才发展的规律，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和人民重大需求，加快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体系建设、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积极谈判、据理力争，达成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展现解决争端的意愿。克服疫情影响，以既定改革举措和区域性的贸易普惠和自贸



升级政策，保持防疫、航天、人工智能、体育等领域科技开放交流，稳住总盘子、开拓新合作，维护了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供应链的运转。据中方统计，2022年1—10月中美货物贸易额同比增长5.1%，达6398.3亿美元，全年数据有可能恢复到2018年以前的水平。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4945.72亿美元，增长6.6%；中国自美国进口1452.58亿美元，增长0.3%。美方数据也显示，中美货物贸易额和中国对美国出口额、美国对华出口额均可能在2022年创历史新高。这一趋势说明，中美经贸关系的韧性并非贸易战、关税强加和脱钩政策所能打破。但是，2022年夏以来美国在华制造业订单和中国输美集装箱量的明显下跌以及部分美企在华产能的外迁动向仍是值得注意的警号，表明双方相互依存度正在受到两国对外战略调整和彼此政治关系冷淡的影响。

2022年，中美两国各自经历了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接下来的两年彼此关系能否趋稳改善，抑或掀起新的风浪，颇受关注。从观察的角度看，经过连续几年的激烈斗争，招数尽出，两国博弈似乎正在由攻守态势转向相持，中美关系能否进入一个相对动态稳定的时期，值得关注。诚然，左右中美关系演变方向的不只是两国战略利益和彼此外交表现，也有深厚的国内政治和全球变化因素。美国中期选举后，共和党取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但是赢面不如预期，算不上“大胜”。民主党保住国会参议院多数党地位，并在共和党传统地带有所斩获，也不算“显输”。今后两年，两党在国会山上激烈争斗、相互掣肘，拜登政府的执政地位总体仍会比较稳固，不至于“跛脚”，同时会遵循惯例，把更多精力放在外交上。如此，拜登政府处理对华关系将更加注重总体部署的精准和迅捷落地，不排除在芯片限制、美台勾连、盟友协调等方面出台更强硬的措施，同时在恢复和加强美中接触外交上摆出主动姿态，以体现“激烈竞争且有管控”的战略态势。不过目前其精力不可避免地要被应付乌克兰危机分散。以佩洛西窜台事件为重要分水岭，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爆炸性的危险点，华盛

顿政客和舆论对形势的判断危言耸听，把 2024 年将举行的美国大选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评估为“最高风险时段”，以台制华、整军备战的紧迫感很强。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开展战略竞争问题上有着方向性的高度共识，为显示各自“政治正确”，在关键涉华议题上比着强硬，学界高度关注美方会出什么样的险招、拜登政府是否会因在乌克兰或其他重要议程上的需要而便易行事，拿中国问题与国会作交易。

同时，需要看到中美关系存在企稳改善的“机会窗口”。维系和抓住机会的根本动力在于，中美双方都有寻求和平共处的需要和加强风险管控的意识。在 2021 年 11 月 16 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率先倡导中美坚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寻求和平共存，拜登总统对此予以积极回应，双方达成重要共识。2022 年 11 月的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申了这一共识。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确认，“可以和中国和平共存”。当然，美方要的是“竞争性共存”。

历史上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充满争斗，鲜有长期和平共处的先例。中美到底能不能实现基于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的和平共处，是一个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如何回答好它，有赖于双方共同探索。据报道，为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两国职能部门即将开展确立指导两国关系原则的磋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 2023 年初访华。人们期待，中美能够探讨和确立实现和平共处所应遵循的原则、准则和优先践行的领域乃至具体方式，其时代意义将不亚于上海公报。即便双方在目前阶段一时谈不成，谈的过程本身对稳定中美关系就有积极意义。现在美方关心的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原则和共识，目的是管理竞争、避免大的冲突。而中方已经提出过一系列更加宏观和富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原则和理念。预期双方将在此基础上深入研讨沟通。在中方看来，中美和平共处须建立在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单方面决定的规则基础上。

中国和美国同为亚太大国，在本地区均拥有广泛和深厚的利益，各有自身的优势和短板，谁也不可能把谁“赶出亚太”。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中美合作则亚太荣、世界兴，中美对抗则亚太乱、世界分。当年若没有中美并肩而战与协商合作，就没有二战同盟国在亚太的最终胜利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没有始于1970年代初期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后来的两国密切合作，就没有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开放性结构和整体腾飞。如今亚太乃至世界各国面临纷繁复杂的共同挑战，中美如不能为应对这些挑战而开展双边合作并共同引领全球合作，人类福祉将无从保证。新时期中美首先需要协调好在亚太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才能理顺两国在世界的关系。如若中美能就彼此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达成共识，这一共识应首先在亚太落地。中美不能让彼此之间的分歧撕裂亚太，而应如亚太多国共同期待的，在不断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缩小和解决分歧。中美有必要理解并尊重对方在亚太的正当权益，超越地缘政治、超越意识形态、超越狭隘利益，探讨在亚太和平共处、良性互动的规则，进而各自和共同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为亚太和平、稳定与繁荣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中美一些共识可以在环太地区先行尝试，通过细化避碰规则、恢复危机热线、联合海上搜救、维护航道安全等方面的磋商，解构冷战零和的思维，筑起和平共处的地基。

## 第四部分 中国的战略选择和亚太愿景

站在亚太地区新的“十字路口”，中国不是被动选择的一方，而是主动谋势的一方。中国的眼界从未被域外力量单方面挑起的战略竞争遮蔽住，而是从确保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个根本战略需求出发，立足亚太、放眼全球，抓住地区国家最突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共识，积极塑造形势、引领潮流，创造中国与周邻国家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此赢得

人心、稳定周边。

党的二十大明确，要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因此，未来 5 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期，同时也是中国立足亚洲、塑造周边、构建亚太共同体的关键期。中国要超越“竞赢”思维，用开放普惠的机制对冲以己划线、脱钩倒退的安排，用包容共赢的倡议覆盖挑动阵营对立的谋划，用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对遏制集团化和过度安全化的动向，与周邻国家共同缔造新的亚太战略谱系。

在我们看来，中国在亚太谋篇布局，需要清醒、冷静、客观地评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有意识地扬长补短、趋利抑害。大致说来，中国要扬的“长”基于地缘紧邻这一天赋的、不可改变也无法选择的事实，基于中国经济对周边地区压倒性辐射力和经济发展倡议和区域融合议程的包容力、吸引力，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力和外交范式的谦和力，以及与地区其他国家守护“亚洲价值观”的共情力。中国所要补的“短”，涉及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意识和能力的构建和完善，涉及未决领土海洋争端对相关双边关系的破坏和消耗力，涉及中国在国有企业、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遭受的政策误读，也涉及受疫情等因素拖累而被削弱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效率，以及增强对地区国际舆论引导力的需求。

在 2022 年 11 月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习近平主席重申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亚太稳定和繁荣作出更多贡献，并向地区国家提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建设和平稳定的亚太”“坚持开放包容，建设共同富裕的亚太”“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建设清洁美丽的亚太”“坚持命运与共，建设守望相助的亚太”四点建议。这是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基本框架，为亚太地区擘画的蓝图和表达的期望。

中国亚太战略的指导理念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亚太地区是这里各国的共同家园，也是世界主要力量利益交汇之地之一。超越分歧，包容差异，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符合亚太各国乃至世界的共同需要。世界正展现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亚太作为世界和平稳定的锚地、经济增长的高地、合作交融的热土，亦是这场变局的重要场域。面对变局，亚太国家做何选择，亚太地区向何处去，将影响 21 世纪世界的基本面貌。应该牢固树立“亚太大家庭”意识，要信任、不要猜疑，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对话合作、不要竞争对抗，要“一个亚太”、不要“两个亚太”，要人人享有发展繁荣、不要极少数人垄断绝大多数财富，要作为世界和平高地和发展极的亚太、不要成为全球动荡和冲突风暴中心的亚太。

亚太各国应全力守住相互开放这条地区关系的“生命线”，维护亚太的整体性和融通性，把这个地区建设成为高度一体化和各国相互紧密关联的区域，而不仅仅是不同国家领土空间的组合。为此，必须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不能允许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推行封闭式集团政治，把亚太国家按价值观分类，将区域经济阵营化，甚至推动军事集团化，使亚太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盘。

“开放的区域主义”建立在亚太地区“多中心”的现实基础之上。亚太地区是多种力量并存并共同发挥作用的场所，而非哪个国家能独享的领地。亚太的未来要靠地区国家共同缔造，不存在以哪个国家为中心的结构，也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亚太世纪”。亚太各国要依托休戚相关、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遵循和而不同、多元共生、风险共担、成果共享的包容性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以共同发展促共同安全、以共同安全保共同发展，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区域关系。

“开放的区域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多边主义，为亚太国家携手应对纷繁复杂

的全球性挑战提供保障。从疫情到气变，从经济复苏到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从数字治理到新兴技术研发应用规则制定，当今世界紧密相连，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加强合作才是正道。亚太地区经济和科技基础雄厚，合作架构缜密，理应作出表率，构建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合作精神和区域韧性，在探索全球治理经验方面走在前头。

中国在亚太地区所追求的目标和原则是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倡导和平稳定、共同富裕、清洁美丽、守望相助的亚太，致力于与国家携手构建命运共同体，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比肩进步的格局。为此，有必要突出以下六大关键着力点。

一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9 月提出，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聚焦发展，为破解发展难题、如期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该倡议为亚太地区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总框架，为亚太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和升级注入了新动能。

二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该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 2022 年 4 月提出，基于“安全不可分割”原则，突出共同安全、合作安全意识，为弥补和平赤字、破解全球安全困境指明方法路径。该倡议为亚太国家践行多边主义、探索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之道、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安全与发展的兼顾提供了重要公共产品。

三是构建“山水相连共同发展空间”。中国有 2 万多公里的陆上国界、3.2 万多公里海岸线，同 14 个国家陆地接壤、6 个国家隔海相望。中国愿与这些山水相连的国家突出共识，放下猜疑，搁置争议，管控矛盾，各施所长，克服疫情，振兴边贸，促进联通，协调建设，共同开发，共享繁荣，让边界两侧的土地成为边疆经济增长带、共同发展合作区，使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为“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四是对接发展战略。积极创造必要政治条件，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亚太国家和国家集团各种发展战略进行全面接轨，包括：俄罗斯的“大欧亚计划”和远东地区经济开发战略，东盟的《东盟共同体 2025 愿景》、“印太展望”和“东部经济走廊”计划，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越南的《到 2030 年第四次工业革命国家战略》，泰国的“泰国 4.0”战略，菲律宾的“大建特建”计划，印度的“印度洋—太平洋倡议”和“季风计划”“数字印度”，孟加拉国的“平稳过渡”战略和“数字孟加拉 2021”战略，太平洋岛国的“太平洋岛国地区合作倡议”“蓝色太平洋大陆 2050 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计划，等等。

五是弘扬“东盟方式”。中国应以东盟为周边和亚太外交的优先方向，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宗旨，坚定不移支持东盟团结和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东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希望地区国家不仅切实支持东盟在众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作用”，更能借鉴东盟多年来促进自身整合、推动区域合作、协调地区问题时奉行的以协商一致、平等外交、透明、不干涉内政、照顾各方舒适度为主要内容的“东盟方式”，使之升华为地区国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亚太方式”。

六是搭建开放式、包容性、复合型地区框架。中方应与东盟等地区伙伴共同努力，依托中国与东盟 10+1 合作、东盟 + 中日韩合作、东亚峰会、中日韩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东盟地区论坛（ARF）、太平洋岛国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CICA）等现有机制，秉持经济安全并重、以经济促安全、以安全保经济的思路，坚持不排斥任何地区成员利益、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坚持守成与创新相结合、强基与拓展相促进，以叠加的圈层方式让多重合作机制齐头并进、相互补充，不断充实、完善地区框架的要件和支柱，发

挥大小机制在不同领域的战略性、功能性作用，共同支撑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欢迎欧盟等域外力量同亚太各种区域、次区域机制建立和发展对话、交流、合作关系，建立广泛的区域内外联系。

基于上述认知，本报告就今后 5 年中国亚太外交所应开展的具体工作规划提出 8 大领域 40 项建议。

## （一）政治

1.1 充分利用现有双多边对话机制，扎实推进亚太伙伴关系网络建设。建立全面的双边政治磋商和战略对话平台，包括与重点伙伴国家开展外交、国防 2+2 对话磋商，增强相互战略保证。

1.2 全面梳理中国与亚太国家签署的各种双边友好合作文件，条件成熟的商谈升级版。激活商签《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工作。

## （二）经济

2.1 充分发挥中国拥有世界最大内需市场、最完整工业体系、最庞大人才红利和全球产业链部分领域领导地位的优势，面向地区中小国家开展增强经济韧性、促进疫后复苏等关键要素合作。鼓励本国产业，包括民营部门和小微企业，向这些国家合理转移，并配合实施“三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安排。

2.2 建设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引导双方合作从传统贸易向跨境金融、数字经济、卫星导航等新经济业态及服贸拓展。将海南自贸区打造成面向东南亚的旅游、航运中心和区域经济总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中国东盟合作有机结合。

2.3 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尽早完成研究，开启多边谈判。全面实施并适时推动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同更多国家商签



高标准双边自贸协定或其升级版，积极推进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进程。基于 RCEP 成果加快中日韩自贸协定研究，适时启动谈判。探索“中日韩 +X”模式，采取联合行动，拓展与其他国家合作。

2.4 面向亚太扩大制造业、农业、服务业的开放水平，缩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优化外资促进服务，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发挥广交会、进博会、服贸会、东博会等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亚洲企业及专业人士，扩大自周邻和亚太国家的政策性进口和商业性采购。

2.5 充分利用“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全球发展知识网络等平台，加快动员发展资源，推进亚太南南合作，为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强劲动力。面向亚太欠发达国家实施更多“小而美”“密而精”的社会民生和人力资源开发项目。

2.6 打造泛在、高速、可及的数字基础设施。融合数字与传统产业，强化医疗、教育、工业等领域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实践分享与合作。共同制定并实施相关规则，推动有助于软件互操作性法规的出台，促进数据在区域内依法、有序、安全、自由流动。

2.7 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推进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加强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地区国家获得可负担、可持续的能源。借鉴国际公认的标准和实践，优化地区内基础设施项目的气候和环境风险评估，建设环境友好型基础设施。鼓励走出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2.8 将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列入亚太发展议程，协调政策和行动计划，在智慧养老技术开发、适老化制度和设施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养老产业发展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商基于权利和性别平衡的前瞻性政策，共建“全龄友好型亚太”。

### （三）金融

3.1 在《清迈协议》、《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等基础上，协调亚洲各国完善共同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保障机制。

3.2 拓展货币互换合作，扩大人民币使用范围，支持香港和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建设。完善上海、深圳与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间的金融基础设施联通，开辟面向亚太企业的 A 股市场国际版。

3.3 鼓励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开发绿色金融工具，为环境友好型和低碳项目提供充足、可预测、可持续的融资。

### （四）连通

4.1 推进《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在 2025 年前完成各方共同确立的倡议和指标，推动形成全面联接和融合的亚太。

4.2 保障“一带一路”重大基建连通项目落地。与泰国、马来西亚积极探索、规划加快“泛亚铁路网”建设，保障中、印尼“雅万高铁”合作项目如期建成，推进“巴基斯坦一号铁路”改造升级。

4.3 支持中国物流企业在周邻建立国际物流基地，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商品的跨境销售、运输、存储以及结算等环节，推动物流一体化建设，催进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嵌入与融合。

4.4 设立区域水资源管理机制，管理利益冲突，消除不公平现象，推动水资源合理和谐共享。

### （五）科技

5.1 便利相关人才流动，提供学科交叉平台，相互开放科研成果，以加强基

基础研究合作，推动优势互补。鼓励城市间科学外交和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的技术合作，优化、深化区域技术分工，激励创新型发展。

5.2 加大中国科研数据云平台的开放力度，吸纳地区内计算和数据平台整合。

5.3 鼓励“科技向善”，推进监管合作，鼓励地区国家共同参与制定和完善普遍接受的规则规范，以弥合数字鸿沟并共管科技发展风险。

5.4 创建“亚太科技分析机制”，推动产学研与政府的定期对话，对域内经济体在科技迅速发展情况下的需求信息展开交流，及时完善能力协同建设的方式方法，实现良性反馈循环。

5.5 发挥各国优势开展科研合作，探讨在太空、深海、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里的项目交流与人才培养。

## （六）安全

6.1 密切域内国家军队交流与合作，加强边境地区信任措施合作，推进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反恐合作、护航和救灾行动，举行中外联演联训。

6.2 继续支持东盟建设无核武器区的努力，保持沟通磋商，积极开展防扩散合作，随时准备好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

6.3 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开展海事合作，共同维护航行自由与航道安全。

6.4 依托中国与阿富汗人道援助和经济重建工作层联络机制、阿邻国外长会、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扎实推进民生、经贸、农矿、互联互通、能力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阿富汗稳定重建。

6.5 推动朝鲜和美国等直接当事方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恢复对话，在六方会谈框架下按照“双轨并进”思路和“分阶段、同步走”原则，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6.6 将中印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依托军长级会谈和边境事务机制会议等渠道，在脱离接触基础上实现常态化管控，防止矛盾激化和失控。

6.7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争取协商一致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COC)，为在南海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共同治理提供规则保障。在航行安全、油气勘采、渔业捕捞、海洋生态等领域加强协调，提供公共产品，打造沿岸国功能性合作机制。

6.8 向亚太欠发达国家提供装备援助和技能培训，搭建符合各方意愿、保持各方主体性的安全赋能合作框架，共同打击毒品走私、人口买卖等跨境犯罪，提升区域协同反恐能力。

6.9 继续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双边网络对话与务实合作，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外空等国际新疆域规则协商，通过区域现有机制，推动制定联合国框架下各方普遍接受的网络空间国际行为规则。

## **(七) 应对全球性挑战**

7.1 全面总结国际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配合，健全、完善亚太地区卫生防疫机制，提升区域卫生治理能力。设立亚太跨国传染病防治信息和创新成果交换中心。加强循证医学和相关政策研究，面向中低收入国家人群健康需求开展干预措施研究，提高欠发达经济体获取专利信息的便利。

7.2 贯彻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强脱贫扶贫经验交流，保障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和人才配备，缓解地区贫困问题，促进地区发展平衡。

7.3 加强区域协同，重点围绕动植物疫病防控、土壤健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农业服贸等开展务实合作，提升粮食安全。

7.4 加强地震、台风、火山、泥石流、区域洪水等灾害信息共享，积极开展人道救灾合作。

7.5 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自身履行碳达峰、碳中和等国家自主贡献新目标的同时，帮助地区中小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尤其以南太、南亚岛屿和低洼地带国家为重点，加强应对海平面上升为核心议程的气候变化应急合作。加强中美应对气变合作，共同发挥区域表率和国际引领作用。

## **(八) 民心相通**

8.1 采取更多便利人员往来的措施，启动旅游复苏计划，支持“东盟旅行走廊”建设。

8.2 在疫后时代大力推进文化、青年、地方、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推动人员相知相亲相融。

8.3 落实向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 10 万研修研讨名额的承诺，其中 50% 的机会面向亚太发展中国家。

8.4 推动区域内高校学生交换、联合培养项目，积极改善中国在签证、毕业后工作权利等方面的政策竞争力。促进访学、夏令营、志愿活动等短期青年交流项目。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tsinghua.edu.cn](mailto:ciss@tsinghua.edu.cn)

010-62771388

清华大学明理楼428A室

<http://ciss.tsinghua.edu.cn>



微信公众号



@CISSTsinghua



@China Forum



CISS Podcast



今日头条号